



“拦婚车小胖”之所以长时间得不到处理,还在于这些小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和重视。长时间纵容、无视的结果,自然会让一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地痞无赖式小恶滋扰群众安宁,降低其安全感。

□史洪举

莫让“强拦婚车”式小恶伤及群众安全感

“拦婚车小胖”是濮阳当地的“名人”，见到婚车便跪下强行要钱，不给钱不停喊“爸爸”，直到要钱为止，价格也从10元飙升到200元。8月1日，“拦婚车小胖”高某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目前，仍有部分受害人没有报案，公安机关希望受害人积极举报，提供线索。（8月2日澎湃新闻）

通过拦婚车向新郎一方索要红包、水果、喜糖、香烟等小物品，一直以来是很多地方的风俗习惯，也能烘托出喜庆热闹的气氛。婚礼举办方往往也会准备一定的礼品主动送给围观者，以便讨个喜庆吉利。然而如“拦婚车小胖”这种

强拿硬要的行为，无疑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是应有之义。进一步而言，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理当严肃查处这种“小错不断”的小恶行为，提高公众安全感。

如前所述，拦婚车索要红包并非刁风恶俗。但类似于“拦婚车小胖”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风俗习惯的界限。一般而言，正常的拦婚车索要红包，通常不会有具体的数额要求，无非图个热闹好玩，即便无人发红包、给喜糖，也不会拦着婚车不放行。反观“拦婚车小胖”，其见到婚车便跪下强行要钱，不给钱不停喊“爸爸”，直到要钱为止，价格也从10元飙升到200

元。其行为已属于拦截他人、无中生非、强拿硬要的寻衅滋事或敲诈勒索。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构成寻衅滋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有这两种行为的，轻则应受治安管理处罚，重则应承担刑事责任。

按说，凡是普通人都清楚这两种行为的违法性质。但“拦婚车小胖”之所以长时间得不到处理，还在于这些小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和重视。对于结婚当事方来说，

举行婚礼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时间节点安排，不能错过。加之拦婚车索要的财物不是太多，如果“固执”地拒不支付财物，就将导致婚车不能顺利通行，影响举行婚礼这一大事。尤其是，结婚乃喜庆之事，如果报警或者与要钱者纠缠不清，势必破坏喜庆氛围，得不偿失。这也是很多受害人宁可花钱买平安也不报警的原因，作恶者也因此肆无忌惮，而案多人少的公安机关未接到报警，自然未必介入此事。

长时间纵容、无视的结果，自然会让一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地痞无赖式小恶滋扰群众安宁，降低其安全感。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等人流量密

集的场所，时不时有未成年人在他人唆使下向一些游客、情侣强卖鲜花、强行乞讨，让人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

建设法治社会，就该“不以小恶而纵容”。作为受害人，理当有积极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即便难以当场向这些小恶行为说不，也可以巧妙收集证据，事后报警。相关部门也该通力协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力地惩戒或发生在民众身边的小恶，以免行为人有恃无恐地持续侵害不特定群体合法权益。如此，方能让群众收获更多的安全感，不至于对这些随意滋事的小恶行为无可奈何，忍气吞声。

公民发言

民宿定义未清，扰民争议难除

□何勇海

晚上十二点左右，门外传来敲门声，赵先生打开门，两个年轻女孩提着行李箱站在他面前问道：“您好，请问几零几号民宿怎么走？”最近一年，住在重庆繁华闹市区解放碑附近某高级公寓里的赵先生对这种深夜打扰不胜其烦。他居住小区的三栋公寓楼一年里冒出来300多家“网红”民宿。（8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

在重庆，居民楼住宅改建民宿并非个案，笔者所在的成都，很多地理位置不错的小区都有民宿，一些热门商圈附近的小区甚至成为网红，有数百家民宿，令业主很头痛。为此，成都市成华区警方还取缔了一小区的7家民宿，这在成都尚属首次。

据说，民宿源自日本，是指利

用当地闲置资源，主人参与接待，也就是家庭式招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这一定义，诠释了民宿与旅馆或饭店有着本质的区别：让游客远离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感受一下小镇乡村的风土人情。故在日本、英国等国家，民宿基本位于农庄、农舍、牧场、温泉、海滨等处，而非身处大城市。

我国虽然也有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但这股“民宿风”如今吹到了大城市里。它们其实就是伪民宿，硬生生地搞成了星级酒店或集体公寓。这就违背了民宿的本意。

城市里的伪民宿，在市民眼里正沦为一种“坏事物”：三五

群、来来往往的租客不断扰民，比如大半夜敲错房门，大半夜进进出出制造噪音影响业主休息，还同物业发生冲突，等等。无论是物业还是公安部门，对城市民宿的管理也颇为头痛：是划分为租房，还是旅馆？

说穿了，城市小区出现民宿乱象的根源在于，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对民宿定性不明确。尽管国家旅游局发布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但对民宿可以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尽管我国有针对旅店业的法律，但民宿这一新生事物并没有纳入，绝大多数民宿仍处于租房或旅馆的灰色经营地带，目前也没有明确的部门监管。这些问题需要得到有效及时的解决。

当我们感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陪伴有时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毛建国

“手机带娃”：城市焦虑，农村更无奈

日前，针对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状况，扬州大学志愿者团队奔赴贵州、安徽、江苏北部等地展开调研，走访了近400户农村家庭。结果发现，长时间玩手机已经成为乡村少年的“流行病”，“手机带娃”在山区，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愈发普遍。有些孩子“吃饭、走路、上厕所，甚至睡觉，手里也紧握着手机”。（8月2日《中国青年报》）

在潜意识里，很多人认为手机普及率、使用率远远高于农村，而手机带来的成长烦恼，也主要属于城市孩子。可这个调查反映的结果并非如此。数据显示，在12-16周岁的留守儿童中，有接近42.7%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其中，超过77.3%的孩子经常手机上网。此外，不少地区乡村儿童的上网时间已经高于城市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其上网数据更是令人惊讶。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人，对于很多农村家庭，特别是留守儿童家庭“手机带娃”的无奈，有着深深理解。当我们感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陪伴有时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可怜天下父母心，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难道他们不想整天陪伴孩子，不想享受孩子成长的快乐？可在生活的压力面前，只能选择背井离乡。这种离开，看似无情实则有情，这其实是对家庭，也是对孩子成长负责。

只是，任何一种无奈选择的背后，都会产生和存在一些负面后果。正如我们知道的留守儿童存在的种种成长问题。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相对于与父母的有形距离，其实更可怕的来自心理的无形距离。其实在这个世界，成长是最大的不

确定性，相对于贫穷的压力，来自外部世界的诱惑，也是成长的极大阻力。

据了解，留守儿童的手机一般都是在外出务工的父母买给孩子的，为的是方便通话交流和远程监管。对于成年人来说，有时都难以面对来自手机的诱惑，何况这些心智并不成熟，有的正处于叛逆期的孩子？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一部手机就是一个世界，他们在手机构造的世界里，不仅找到了情感依托，而且找到了价值认同。这些孩子大多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也很难实施有效的指导与干预，因此手机在他们的世界里很容易流行。

不必讳言，无论在校园还是在家庭，手机现在都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很多父母出于解决沟通和陪伴问题的考虑，给孩子提供了手机，可是，手机就像一个“大嘴怪”，一口吞下了接近它的孩子。于是，就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了手机，可能稍微让父母轻松了一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产生了新问题。而新问题相对于旧问题，可能还要严重，连“两害相权取其轻”都没有达到。

“手机带娃”，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制造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这个新问题还十分严重。其复杂性在于：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主观和客观上，特别是在家庭教育上，实践“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手机带娃”还是一道社会难题，全社会都得接过重任，比如家校同频共振，比如机制化和志愿化的关怀帮助，都是十分需要的。

学生阅读经典，能读下去就好

□吴云青

近日，浙江师范大学教师常立的文章《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引发广泛探讨。常立认为曹文轩作品《草房子》中存在性别观、儿童观对孩子来说不妥，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阅读曹文轩作品。而《草房子》在新课标指定的小学生必读书目中榜上有名。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孩子抱怨必读书目著作“读不下去”。

比起《草房子》应不应该给孩子读、应不应该列入小学生必读书目，我以为，孩子们抱怨“读不下去”更是个问题。

读书，能读下去是一切的前提，为此培养阅读兴趣非常重要。否则硬着头皮读，既无愉悦感，也很难自然汲取营养，带着厌烦情绪或逆反心理去读，犹如拎着锤子找钉子，更容易“发现”旁门左道。常识告诉我们，培养阅读兴趣，应当从轻松阅读开始，有乐趣，才有朝向书籍世界继续深入的动力，而那些强行施

加的“枷锁”都是对兴趣培养的减分项。“必读”二字就是一个“枷锁”。

中小學生真正“必读”的内容，按说都已经进了教材了，教材之外的“必读书目”其实是个“强烈推荐”清单，并没有考核约束力，却顶着“必读”二字吓人，况且还这么长。每一年的“必读书目”都列了七八本甚至十几本之多，令人怀疑到底有多少孩子能完成这项任务，以及这些书是否都配得上“必读”二字。

多读书、多读好书，当然对人有无穷的益处，我们确实可以列出很多“不读实在太亏”的书来，也不妨给中小學生列个推荐书单，但这份书单不宜过长，也不可迷信名人或“童话”的标签。部分童书确实存在少儿不宜的内容，还有些童话包含太多现实隐喻，不适合孩子阅读。但要挑几部绝对“无害”的作品，恐怕也难。最近网上就有人对名著进行“三观审查”，批评《红与黑》《包法利夫

人》等名著“三观不正”，这当然有失狭隘，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是人之常情。

阅读固然重要，但无法承担家庭和教育的全部重量，无法代替生活的浸润和家长的言传身教。任何人接触世界都不止于阅读一途，有些争议和糟粕是防不了、避不开的，比起童书里的“潜在问题”，孩子在生活圈子中接触的明显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而一个孩子只要喜欢阅读，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自然会多读书，长见识，学会取舍，从而学会正确对待书中的争议和糟粕，乃至生活中的负能量。

用鲁迅的话说，“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须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孩子只要养成了健康的阅读习惯，开卷总是有益。而培养这样的习惯，当从少量、优质的经典开始，为此不妨给孩子列个短小精干的推荐书单，能读下去就好。